

二十世紀 中國新文學史

作者／皮述民・邱璽友
馬 森・楊昌年

駱駝出版社印行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

皮述民・邱燮友 著
馬 森・楊昌年

駱駝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皮述民等著．--三版．

--臺北市：駱駝，2003〔民92〕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9549-48-6(精裝)

1. 中國文學－歷史－現代(1900－)

820.908

92014847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

一版 1997/08 1999/09

二版 2001/09

三版 2003/09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680元

著者：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年
發行人：陳巨擘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駱駝出版社
地址：台北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 23695250・23695680
真：(02) 83691393
總經理：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撥：41299514

裝訂：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950號

ISBN 957-9549-48-6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mail.liwen.com.tw

序 言

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執教多年的皮述民教授，落葉歸根後轉來文化大學任教。因為擔任了一門中國新文學史的課程，卻苦無合適的現當代文學史的教材，遂起念自己編寫一部現當代中國文學史以爲應急之需。他這個念頭首先得到在台灣師範大學教同一課程的楊昌年教授的響應。爲了在較短的時間中編出一部內容比較詳實的文學史，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應該是比較合理的選擇，因此又邀了同樣在台灣師範大學任教的邱燮友教授和在成功大學執教的我共謀其事。如此組成了一個四人編寫小組，一方面因爲我們四人的研究專長恰巧分別爲小說、散文、詩和戲劇，正好可以各自擔負書寫文學史中的一個文類，另一個原因是湊巧我們是大學時代的同窗，多年老友的情誼，也是促成這次合作的重要原因。

爲什麼要編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而非像過去已有的同類著作，分別編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或地區性的「台灣文學史」呢？除了針對大學新文學史課程的需要之外，也有些學理上的道理。至於爲什麼非要自己來編，而不用現有的現當代文學史作爲教材？當然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

回顧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自從1895年我國在中日甲午之戰中失利被迫簽訂馬關條約革讓了台灣以後，即遭遇到一連串驚天動地的大事，從而改變了國人的命運。先是辛亥革命結束了數千年君主專制的政體，繼之有軍閥混戰及連續八年的抗日戰爭，消耗了無算的國力與資源，後來的國共內戰更把國人推上了生靈塗炭、民生凋敝的道路，而終於造成了今日兩岸睽離的局面。伴隨著百年來社會的急遽變革與

動盪，中國文學也經歷了空前的轉變；東來的西潮與五四前後的白話文運動促生了以白話為表達媒介的新文學。今日研究中國文學的人，不得不首先把中國文學劃分成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兩大領域，因為二者不管是所用的語言還是所傳達的思想內涵，都是截然不同的。古典文學一向是文學研究者情有獨鍾的對象；相對的現當代文學則是一個開發未久的新領域。如果我們拋開貴古賤今的偏見，就不能無視現當代文學非但跟我們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且今日的當代，勢必為明日的古典，其所蘊含的潛力與價值自然不在古典文學之下，這就是為什麼在今日的學府中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投注於現當代文學的研究。

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正像古典文學的研究一樣，不外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三個範疇，而且三者之間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文學史又是跨入史學領域的一門學問。一般的文學史家，多半採用史學的方法，重視的是史料的蒐集和客觀的詮釋。但是也有些文學史家自己提出一種理論作為敘述以及詮釋的基礎，例如十九世紀法國的文學史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93）在他的鉅著《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63）一書中就提出「種族、環境和時代」（la race, le milieu et le moment）作為敘述流變及詮釋作品的基準，對後世的影響頗大。近代的中國文學史家除了採納泰納的理論外，也常潛襲或明目地加上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以及「階級鬥爭」的理論，潛襲的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明目的如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文學史。

由於中國近代的變革，政治的參與常常主導了研究者的態度，特別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階段中，為了爭取歷史的詮釋權，或為了依附於一個政黨，或甚至於只是出於在強權之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馬克思的理論一度成為眾多文學史的主導思想。馬克思的理論，正像任何其他理論一樣，必有其一定的洞見，也必有其一定的障蔽，而不可能

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我們在起意合作的時候，首先都同意必須回歸史學的客觀性，如果有觀點的話，那就是從文學本身的價值和條件作為出發點。我們都不是熱心參與政治的人，我們要寫的是從民間的立場來評介文學的文學史。

當然，也有人認為在文學史裡根本無所謂客觀的史實，在史料的選擇中更難免有價值的判斷（例如韋勒克在《文學論》中的意見）。我們認為這應該是一個程度認定的問題，含有某些不自覺的主觀的客觀，絕不能與自覺的主觀同日而語。我們所謂的客觀，是自覺地放棄個人的好惡與成見，在寫作過程中參與撰寫的人不但隨時需要溝通、協同與檢討，而且每個人也要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才行。我們也瞭解到歷史的時過境遷，前一個時代的氣氛與規範隨之而失，對後代的我們而言已感陌生，為了追索過去的心態，適當的一點「歷史主義」（historicism）想來也是必要的。

我們相信，文學史並非由無數各別作家的碎片連綴而成，而是一條無法切斷的河流，有它的源頭，有它接受的外來的支流，當它匯成一條主流時它會挾帶著各式各樣的多色的成分，但它必定也會表現出一種共同的顏色和形貌，蕩蕩然流向未來。因此現當代文學的整體性是我們企圖把握的重點。

書寫現當代文學史，就是描繪一條河的流動狀貌。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雖然還是個新領域，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近年來卻並不冷落，特別是中國大陸更顯熱絡，出版的很多。較有名的，例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3）、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1994）、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郭志剛、董健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1980）、張鐘、洪子誠等主編的《當代文學概觀》（1980）、山東大學等主編的《中國當

代文學史》（1980）等，都很容易看到。這些著作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分別書寫，二是很諷刺地與大陸政府所倡導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恰恰相反，這些現當代文學史都沒有收入台灣的文學。我們感到這樣的書寫恐怕無能呈現一條河流的整體面貌。

現當代文學分別書寫，主要的考慮可能是因為二者的性質有別，其次的考慮可能是以免篇幅過長。一般研究文學史的學者都以1949年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水嶺，這種區分所以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不但因為在大陸的所謂「社會主義文學」與五四以來的以寫實（或擬寫實）主義為主流的現代文學大異其趣，而且也因為台灣與大陸自1949年後形成了各自發展的格局。台灣的當代文學，不論認為它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還是自成一系，都是不容忽視的，因此以1949年劃分現當代文學，對台灣的文學同樣也是適用的。我們之所以企圖把現當代文學合為一書，當然是為了符合我們描繪一條河流的願望，使這兩個時代有一個合理的銜接。縱然二者的性質有異，但在歷史的流動中仍有其連貫之跡可尋，不截斷的河流才能使讀者對現當代文學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至於台灣的文學這一部分，在大陸通常見於另外書寫的地區文學史，如白少帆、王玉斌等主編的《現代台灣文學史》（1987）、公仲、王義生的《台灣新文學史初編》（1989）、劉登翰、莊明萱等主編的《台灣文學史》（1991）、黃重添的《台灣新文學概觀》（1991）等。此一現象使人覺得跟葉石濤寫作《台灣文學史綱》（1987）把台灣文學視為獨立於中國文學以外的觀點如出一轍。

對台灣文學，我們的看法是不論在日治時代還是在49年後，台灣文學都具有一個特殊的位置。日治時代是因為台灣處於日本殖民地的地位，不能不受依附日語文學及反日情緒的雙重影響；49年後則與大陸文學分道揚鑣，各自獨立發展。雖然我們認為台灣文學具有其特殊的地位，卻並不認為應該把台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之外。我們的

理由是：第一、「中國」一詞不只是個地域和代表主權的名詞，同時也蘊含了血緣和文化的指涉。台灣的居民沒有理由只是爲了不願與共產政權認同，就放棄血緣上的「中國人」的頭銜，正如沒有人因爲與堂兄弟不睦而去更改自己的姓氏一樣。至於文化的中國，過去的歷史以及目前所用的語文等等，都不是說丟就可以丟掉的；何況現下政治的情況及國際的局勢還沒到迫使台灣非走向獨立建國的道路不可的地步，今日來排斥中國文化，豈非庸人自擾？第二、日治時代的漢語文學，不論在客觀的傳承上，還是在當日作者的主觀認同上，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國文學。國人書寫的日語文學，如加以漢譯，自也可納入中國文學的範圍。49年以後的台灣文學，傳承自日治時代者少，傳承自五四以後的現代文學者多，雖然與大陸當代文學分道揚鑣，台灣與大陸的當代文學實在可以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個支流。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採取治台灣與大陸文學於一爐而分章書寫的方式，以便彰顯二者之間的既有脈絡可通又各具特色的對比關係。

其實這個工作在我們之前已經有人做過，例如張毓茂的《二十世紀中國兩岸文學史》（1988）和喬福生等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1992）。不過由於我們所持的敘述和詮釋的立場是非政治的和非馬克思的，相信與前者仍會有所不同。

然而，所有以前出版的現當代文學史都是我們參考的資料。除了以上所舉的各書之外，我們也參考了劉心皇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971）、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1975）、周錦的《中國新文學史》（1876）、劉文田等編《當代中國文學史》（1991）、金漢主編《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1992）以及各別文類史，諸如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趙遐秋、曾慶瑞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84）、田仲濟、孫熙昌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史》（1984）、嚴家炎著《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1989）、古繼堂著《台灣小說發展史》（1989）、汪名凡主編的《中國當代小說史》（1991）、

楊義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93）、田漢等主編《中國話劇五十年史料集》（1958—85）、呂訴上著《台灣電影戲劇史》（1961）、辛墾編《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二編（1976）、吳若、賈亦棣編《中國話劇史》（1985）、陳白塵、董健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1989）、葛一虹編《中國話劇通史》（1990）、黃會林著《中國話劇文學史略》（1990）、張炯編《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高文升編《中國當代戲劇文學史》（1990）、馬森著《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1991）及《當代戲劇》（1991）、柏彬著《中國話劇史稿》（1991）、田本相主編《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1993）、楊渡著《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1923—1936》（1994）、蕭蕭著《現代詩縱橫觀》（1991）、張默編《台灣現代詩編目》（1992）、洪子誠等編《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林非著《中國現代散文史稿》（1981）、趙遐秋著《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1987）、張華主編《中國現代雜文史》（1987）等著作。

雖然有如此衆多的先行者的著作做為前鑒，我們仍不敢自詡為後出轉精，因為每一部文學史都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的障蔽，或蔽於資料的取捨，或蔽於觀點的殊異。我們雖然基本上都主張從藝術的觀點論文，盡量擺脫政治觀念、宗教信仰、社會理論等非文學因素的干擾，可是我們仍保有了各自的行文的風格和評介的標準，是無法取得統一的；當然也沒有取得統一的必要。我受其他三位老友之託，負責最後會整和通讀的工作，其實我所做的不過是改正有時難免的筆誤以及體例上的整合。至於文字和見解仍保留各人的原貌，就讓我們各自帶著自己的缺點和不足面對我們的讀者，並就教於大方。

我們分工的細目，請參閱本書目錄。

凡 例

- 一、本書以時間爲經，以地區爲緯，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做整體性的綜述
- 二、本書所述僅以新文學爲對象，二十世紀之古典詩文不在本書討論之列。
- 三、本書採取橫排，以便於阿拉伯數字及外文之書寫。
- 四、對各家作品，以敘述及評論爲主，偶有引文，亦十分精簡。唯對各家之重要作品均加以提示，讀者可自行參考。
- 五、所有註解均附於每章之後，以便讀者檢閱。
- 六、有關徵引及參考書目，詳列於書後。

目 錄

序 言	馬 森／ I
凡 例	／ VII

第一編 導論：危機四伏（1901年以前）

第一章 西方勢力的擴張與中國門戶的開放	馬 森／ 1
第二章 西風東漸對中國社會和文化所帶來的衝擊	馬 森／ 8
第三章 中國古典文學面臨的西方文學挑戰	皮述民／ 14

第二編 山雨欲來（1901－18）

第四章 西方文、哲學的譯述與本國的論、散文	楊昌年／ 21
第五章 國語運動與文白之爭	楊昌年／ 35
第六章 新劇肇始與文明戲之興衰	馬 森／ 56
第七章 新詩理論的建立（附論嘗試集）	邱燮友／ 81
第八章 新小說的誕生（附論魯迅）	皮述民／ 90

第三編 除舊佈新（1919－36）

第九章 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	皮述民／ 111
第十章 文學社團的蠶起與發展	馬 森／ 119
第十一章 新詩的成長	邱燮友／ 132
第十二章 新散文運動蓬勃開展	楊昌年／ 159

第十三章	新小說的成長	皮述民／192
第十四章	戲劇文學的建立	馬 森／232

第四編 救亡圖存（1937－48）

第十五章	抗戰文學形勢概述	楊昌年／253
第十六章	話劇運動的鼎盛	馬 森／275
第十七章	動亂時代的寫實詩歌	邱燮友／283
第十八章	抗戰與內戰時期的現代小說	皮述民／299
第十九章	戰爭時期的散文	楊昌年／331

第五編 分道揚鑣（上）—台灣：

從戰鬥文藝到現代文學（1949－79）

第二十章	國府遷台後的局勢與文勢發展	邱燮友／351
第二十一章	戰鬥詩與現代詩	邱燮友／359
第二十二章	散文的崛起	楊昌年／385
第二十三章	從反共小說到現代小說	皮述民／399
第二十四章	反共戲劇與新戲劇的興起	馬 森／432

第六編 分道揚鑣（下）—大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的講話〉持續主導文學（1949－76）

第二十五章	社會主義下大陸局勢與文學發展	馬 森／452
第二十六章	文化革命前的現代小說	皮述民／461
第二十七章	社會主義的詩	馬 森／472
第二十八章	現實主義的戲劇	馬 森／482
第二十九章	散文的衰微	楊昌年／491

第七編 當代文學（上）——台灣當代文學（1980－97）

- | | | |
|-------|--------------|-------------|
| 第三十章 | 台灣當代文學概述 | 皮述民／502 |
| 第三十一章 | 小劇場興起以來的當代戲劇 | 馬 森／508 |
| 第三十二章 | 現代詩與鄉土詩 | 邱燮友、潘麗珠／523 |
| 第三十三章 | 台灣當代散文 | 楊昌年／552 |
| 第三十四章 | 多元的當代小說 | 皮述民／575 |

第八編 當代文學（下）——大陸當代文學（1977－97）

- | | | |
|-------|---------------|-------------|
| 第三十五章 | 大陸當代文學概述 | 馬 森／607 |
| 第三十六章 | 桎梏鬆解之後小說的蓬勃發展 | 楊昌年／613 |
| 第三十七章 | 開放以來的新戲劇 | 馬 森／656 |
| 第三十八章 | 朦朧詩與現代詩 | 邱燮友、潘麗珠／662 |
| 第三十九章 | 散文的再興 | 楊昌年／688 |

第九編 結論：天際曙光

- | | | |
|------|-----------|---------|
| 第四十章 | 檢討過去 展望未來 | 馬 森／712 |
|------|-----------|---------|

跋：感謝與期盼	皮述民／715
---------	---------

修訂說明	楊昌年／719
------	---------

參考書目

- | | |
|--------------------|------|
| 一、文學史及一般史料 | ／721 |
| 二、文學理論與批評 | ／723 |
| 三、小說史、小說理論及批評、小說資料 | ／725 |
| 四、戲劇史、戲劇理論及批評、戲劇資料 | ／726 |

五、新詩史、新詩理論及批評、新詩資料	/730
六、散文史、散文理論及批評、散文資料	/731
七、外文書目	/731

第一編 導 論：

危機四伏（1901年以前）

第一章 西方勢力的擴張與中國門戶的開放

一、中國的屈辱與轉機

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已成當代史家的共識。發生在1840至1842年中英兩國之間的鴉片戰爭，導致中國與西方列強第一次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①，是中國的屈辱之始，也是中國脫胎換骨的轉機之始。從此以後，直到世紀末，在短短的六十年間，中國與西方列強以及後起的日本屢戰屢敗，敗後不得不割地賠款求和。除去割讓了香港、澳門、台灣之外，膠州灣、旅順、大連、威海衛、九龍、廣州灣等地也先後被德、俄、英、法諸國強佔。賠款則動輒白銀數百、數千萬兩，把中國剝削得民窮財盡。再加上強制中國開放通商港口，代收關稅，在大商埠中強租租界地，施行治外法權，使中國的門戶洞開，中國的國土則成為列強覬覦的一塊肥肉。

自商、周立國以來，歷經兩千多年的王朝興替，中國本來自然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民族和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文化形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向來自給自足，不假外求。過去的對外交往多半是有限度的，所受外來的影響也是在自主的情況下發生，像東漢以降的佛教以及胡樂、胡服的輸入無不如此。甚至數度的外族入侵，也都以同化於

漢族文化做為終結。但是十九世紀中葉的這次西方列強的入侵，與過去的歷史大不相同，這次的衝擊非但打破了中國一向自給自足的傳統模式，而且使中國從此不得不改弦易轍，走上了另一條新文化的不歸路。這種情勢，如果從全世界、全人類的角度來看，實在存有不得不然的道理。

像中國這樣歷史悠久，人口衆多的大國，所以會屈服於西方的列強威勢之下，自然是因為西方的列強真正有其強悍之處。在十四世紀以前，中國的文明以及科技的水平本來都在世界各國之上^②。十三世紀義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東來中國，正因欽羨中國的文明，仕元二十餘年始歸，著書盛道中國社會之繁華富庶文物昌盛。可是十四世紀以降，西歐的人文科技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在短短的數百年中遠遠超過了中國，以致在十九世紀中期中國與西方列強遭遇時，遂處於絕對的劣勢。要瞭解西方國家之所以變得如此強盛，則不得不從西方的近代歷史說起。

二、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背景

西歐的海洋氣候和自然環境十分優越，既沒有中國的嚴寒與酷熱，也沒有中國那種頻繁的水旱天災，如果不是人為制度的障礙，西歐早應產生了更先進的文明。只因中世紀的歐洲深陷在貴賤有別的封建制度中和保守教會的思想控制下，才使民智不開，產業落後。其實西歐一直在等待一個突破點，以改變其落後的面貌。這個突破點就是文藝復興運動。肇始於義大利翡冷翠的文藝復興，其內涵在於重新發現希臘文明，落實了說就是繼續發揚希臘的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濱海的民族本來富於冒險，擅於經商，西歐各國在貿易往來互通有無之餘，一面發揮了文化的擴散作用，一面也隱隱滋生出一種彼此激勵、競勝的力量，使湮滅了的希臘文明的灰燼又漸漸地復燃起來。因此西歐的海

洋地理，既是促生文藝復興的有利背景，又成為助長希臘文明的復現、擴散與延續的動力。希臘文明本來就是一種海洋文明，西歐的自然條件又再度發揮了海洋文明的優越性。希臘的人文主義使沾潤了文藝復興氣息的西歐諸國，得以揚棄中世紀蔑視人權的黑暗制度，步向尊重人權的民主政治；希臘的科學精神則使西歐諸國得以突破中世紀宗教的迷障，以更理性的方式來認識世界。

西歐諸國在十八世紀得以各自凝聚成一股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力量，正源於文藝復興運動所帶來的宗教信仰、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的大變革。首先是發生在十六世紀德國的宗教革命，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思想的引導下創立了與羅馬教廷相對抗的新教。新教很快地蔓延到北歐和英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認為新教的教義是促生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③。

其次是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次溫和的革命在政治上導致了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在經濟上則為英國的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君主立憲一舉解除了國王的立法權和行政權，治國的權力落在議會和政黨的手裡，自然也就等於操於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之手。這樣的政治環境有利於工商業的擴展及資本的累積，使英國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成為世界上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手工業的快速成長刺激著科學的發明，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於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不但把手工業生產推進到機器生產，而且大大改進了運輸交通，使英國一躍而成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國。英國的工業革命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在一百年間蔓延到西歐及北美，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及二十世紀前期又繼續波及到世界上的其他各地，形成了全球性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潮流^④。

到了十八世紀，有兩件大事對世界的影響都非同小可：一是1776